

# 伊盟革命回忆录



YIMENG GEMING  
HUIYILU

# 伊盟革命回忆录

第五辑

中共伊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四月 东胜

# 目 录

|                  |                   |                  |
|------------------|-------------------|------------------|
| 无形的战线.....       | 黎 光<br>苗生东        | 忆述<br>整理 ( 1 )   |
| 烽火草原十二年.....     | 张贵斌<br>刘占宽        | 忆述<br>整理 ( 10 )  |
| 战斗在鄂尔多斯高原上.....  | 严平 图布升宝 高乐<br>马步萧 | 忆述<br>整理 ( 25 )  |
| 杭锦旗的和平解放与改造..... | 乔桂章<br>乔澍声        | 忆述<br>整理 ( 92 )  |
| 回忆纳宋典勒格.....     | 张秉义<br>何知文        | 忆述<br>整理 ( 136 ) |
| 挺进乌审旗.....       | 白进宝               | ( 150 )          |
| 我所知道的蒙汉游击队.....  | 杨勤生<br>延光先        | 忆述<br>整理 ( 190 ) |
| 云泽同志到河南.....     | 何知文 熊万荣<br>陈修温    | 忆述<br>整理 ( 193 ) |
| 在伊盟支队.....       | 乌日图那素<br>王庆富      | 忆述<br>整理 ( 195 ) |

|                |            |               |
|----------------|------------|---------------|
| 大沟湾的一次小战斗..... | 钱玉宝<br>白进宝 | 忆述<br>整理(219) |
| 回忆曹动之同志.....   | 乔桂章<br>乔明  | 忆述<br>整理(223) |
| 战斗在敌营.....     | 李文英<br>甘维纲 | 忆述<br>整理(236) |
| 三边纪事.....      | 陈春城<br>全学军 | 忆述<br>整理(246) |
| 在战斗里成长.....    | 刘永飞<br>张增明 | 忆述<br>整理(253) |

# 无 形 的 战 线

黎 光 忆述

苗生东 整理

我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做情报工作先后共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一九四〇年五月，第二个时期是一九四〇年十月——一九四二年底，第三个时期是一九四五年三月——一九四六年七月，总起来说就是三进伊盟。

## （一）

一九三九年以前，我是延安新中华报社的记者，此是我的公开身份，实际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出做侦察、情报工作的。三九年二月，伊盟工委书记赵通儒给边区保安处长周兴同志写信，要求派一名保卫干部来伊盟工委工作，周兴即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我同意了。

接受任务之后，经过充分的准备，同陕甘宁边区派往伊盟的五、六个党政军干部同行，于三月中旬来到了伊盟工委所在地乌素加汗（桃力民附近）。伊盟工委是党的地方组织，当时不公开，对外称为八路军联络参谋处。上校参谋赵通儒实际是工委书记。工委当时主要工作任务是：建党、建军、统战、组建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几项工作一起抓。群众组织的名称是抗联会，是一个半政权组织，伊盟七旗均有。我去那里的身份是伊盟工委的保卫干部，在工委的领导下做伊盟各地的保卫、情报工

作。

伊盟工委所在地乌素加汗原驻八路军的一个骑兵团，我去前骑兵团撤走，只留下一个骑兵排，约20余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开始扩充军队。到三九年秋就扩大到三个连。一个连驻白彦花附近的中滩，其他驻乌素加汗和桃力民附近，成立了一个骑兵营，归伊盟工委领导。我被宣布为骑兵营的特派员，兼管部队的保卫工作。此骑兵营共二百多人，营长曹动之，政委刘瑞森，后杨一木接任，下来就是特派员，文书，军需干部等。我这个特派员，在抓部队保卫工作的同时还掌管工委的保卫情报工作。在这一时期，部队的保卫工作处理了这样一件事：一天，部队出现了一个逃兵，抓回后因怕其再跑，将其用绳子吊在房梁上，结果这家伙第二天还是跑了，就又派骑兵追了回来。此人原是绥西特委介绍来的，过去曾当过土匪，为了安定部队，保卫绥西地下党，工委报请上级批准，枪决了这个家伙。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赵通儒让我用延安新中华报社记者的身份到河套傅作义八战区副长官部所在地搜集社情。我带着赵通儒给几个关系写的信，由交通引路，经杭锦旗过河先到临河县落脚。那时绥西特委书记是刘瑞森，他和一个山东籍的刻字工人住在临河县城某处。我去的那天晚上刘不在，我就和那个刻字工人住在一起，并编了一套假话，防止警察查户口。到了晚上，果然来了查户口的，由于我们事先有准备，他们没有看出任何破绽，几天后我移住在临河县文化馆。那时傅作义与我党的关系较好，那里地下党的宣传半公开化，文化馆的人员公开讨论什么叫法西斯主义，什么叫共产主义，什么叫三民主义等。在临河，地下党组织帮助我做了服装，换了装扮，印好了名片，即到陕坝，在省政府找了一个副秘书长一类的人。此人是赵通儒介绍的，我的印

象他是一个脱党者，因为他说：“我和党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你若有党的文件不便保管，请交我代为保存。”当时，为了慎重起见，我未将所带的东西交给他。我采访了教堂，印象很深的是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已深入到边陲地区。陕坝教堂有武装，有法律，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

调查采访了五、六天后，即到八战区副长官部所在地五原县，找到了傅部的一个政治部主任和周北峰，专门找些傅部里比较进步的人进行采访。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一队兵簇拥着一个骑马的人，与我同行的人暗中对我说：“这就是傅作义，赶快上去求见。”我即上前递上名片，约请接见。傅问清了我的住址后，约定第二天接受我的采访。次日，傅派人叫我到长官部谈话。根据我的提问，傅简要的介绍了绥远抗战的情况和经验等问题。他最后对我说：“回去后代问毛先生好。”并要求我不要把他谈的情况在报纸上发表，不要说见过他。在五原，我的行踪已被特务们注意。一天，有两个商人装扮的人来到我住的旅店，自称是大青山派到这里找地下党组织的，请我为他们打听下落。我看出了他们的诡计，回答说不知道。随后我又故意找店掌柜说：“这两个人不象抗日分子，他们破坏团结抗战，若再来纠缠，我要把他们送给警察局。”店掌柜说：“你最好不要到警察局报告，他们就是便衣。”

五月中旬我到中滩收集了一些情况并布置一些工作，二十日返回乌素加汗，又用八路军工作人员名义在杭锦、鄂托两旗的一些村镇布置情报网。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秘密发布“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从此以后，绥西特委和我党的一些半公开人员就呆不住了，随即逐步撤回。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准格尔旗奇文英到重庆拜见了蒋介石，并受到了嘉奖。我奉赵通儒之命，以八路军联络参谋部的副官名义前往准格尔旗表示祝贺，开展民族统战工作。与此同时，我还奉命去东胜办了一起交涉。我党在准格尔旗的一个联络据点（给大青山做交通联络的）被敌人破坏，据点负责人李涛（李怀勤）等三人被二十二军高双成部的左协中旅长抓走，我赶到东胜县时，左协中已放了我们的的人。

一九四〇年五月份，我回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汇报工作。毕后我正准备返伊盟，布鲁部长（侦察部长）对我说，伊盟工委和部队准备撤回，这样我就暂时留在边区。

## （二）

一九四〇年十月，我由延安调往定边，做北线的情报工作。任务是在定边建立外勤据点，负责定边、绥远、宁夏、安边和宁条梁一带的情报工作。我是据点的负责人，工作人员有：周一凡、胡建平、何玉殿（何书田）等人。我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三边警备司令部上校联络参谋。周一凡先后在盐池、张家畔活动。那时，安边、宁条梁是国统区，驻有国民党部队十一旅。此部队有我们党的地下工作，其一团表现进步，二团史舫成很反动，还有保安团张廷芝、张廷祥兄弟的反动武装。我们的方针是帮助十一旅进步势力，反对反动势力。

一九四一年秋，中央得到情报说：国民党计划让其嫡系部队何文鼎的六十九军进驻安边，与十一旅换防，意将进步力量调走，换上最反动的部队，以封锁陕甘宁北部。中央对此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组织了指挥部，王震为司令员，贺晋年为副司令员，

调集了约七个团的兵力，口号是反对何文鼎搞磨擦，静观何文鼎，一旦起动，即抢先占领阿拉庙，白泥井，东堂子，城川等边沿一线，将何文鼎困死在沙漠中。结果，何文鼎未敢南下，我们只解放了城川，其余各点也未占领。

一九四一年底到四二年初，边区保安处又在靖边建立一个外勤据点，据点的负责人是李启明。我仍在定边据点负责。其分工是：张家畔、宁条梁、安边（包括榆林一线）以北以东为靖边据点所辖范围，定边以北以西、宁夏、蒙古地为定边据点所辖范围。后来靖边据点自身出了问题，李启明同志被调回延安，组织又派来葛申同志负责。这时我病的很重，不能坚持工作，所以，于四二年底组织决定两据点合并，统一由葛申同志负责。到了一九四三年，边区保安处将各情报站的人全部抽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接受审查。此时工作停顿。

四〇年十月至四二年夏，胡建平、何玉殿在定边街上还开了一个小商店（实际是个情报联络据点），名为“义盛西”商店。他们以商人身份在定边、安边、鄂托克、乌审旗边沿地区活动。在这一阶段，我情报干部在这一带活动的约有十人，我记得的有李启明、葛申、周一凡、何书田、胡建平、罗林、欧阳、小冯等。

### （三）

一九四五年三月，正值“七大”前夕，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又决定恢复北线工作，在定边建立情报组，名称是“绥蒙情报组”或“三边情报组”，对外叫三边司令部联络科。这时布鲁调绥德，任专署公安处长，李启明任边区保安处的情报科长。有一天周兴

处长和李启明同志把我和葛申带到西北局书记高岗那里，由高岗给我们布置任务，高岗说：“中央估计一年打败日本，那时苏联红军将出兵东北。我们和国民党在华北将有一个大的争夺战。现在派你们去，要先把那里的情报工作做好，以配合这个争夺战。你去找刘瑞森（刘原系绥西特委书记，当时在延安）同志谈谈，看有哪些地下党关系可以交给你们。”

根据绥蒙情报组之任务，我们调了一批干部到绥远工作，原则是凡能在绥远落脚的人，都在选调之列。延安各单位、学校，凡绥远籍的人，和傅作义部有关系的人，晋绥傅作义的老乡，都尽力予以选调。

五月份，苏联红军攻克了柏林。这时，情报组工作也基本准备就绪。中旬，我们从延安陆续到了定边一带开展工作。记得那时先后在此组工作过的约四十人：葛申、余光、高克、赵会山、霍流、胡建平、张兴、鲁南、赵良（刘璧）、梁继民、马静波、张景文、周一凡、邓发财、何书田、云北峰、于立修、楚凡、韩培明、高杰、王玉、董英等。情报组长黎光，副组长先葛申，后余光。

我们那时在定边的具体工作和任务，主要是做绥远的包头、伊盟和宁夏等方面的工作，重点是傅作义部队。派出情报人员搜集情报，搞策反等。当时，我们派出去的人很多，他们的姓名及工作情况，就记忆所及忆述如下：

胡建平、何玉殿同志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干部。我们四〇年十月到定边时，胡、何二人以商人身份在定边开“义盛西”商店。延安整风期间他们没有回去，仍隐蔽在定边。到日本投降前，他们的身份已经得到社会承认，何玉殿可以到宁夏，胡建平可到安边活动。一九四五年后，三边贺晋年的部队原计划向陕南

发展，到湖北襄阳地区创建根据地。日本投降后，根据党中央在东北、华北与国民党争夺的决策，军委组织了绥包战役。按当时战役计划，由华北我军解决绥远傅作义部，估计傅军会溃退到河套、伊盟一带，贺晋年部队将由三边出击，以消灭傅作义的残兵败将。根据这种形势，绥包战役前，情报组派胡建平，用安边商人的通行证，驮上皮毛经伊盟地区到包头做情报工作。何玉殿为交通。绥包战役结束后，胡建平回到安边报告说：“围城期间，曾将情报纸团投掷出城。但未与攻城我军联系上。”

赵良同志，是一名青年共产党员，为搞日本特务机关的情报，曾派在伊盟乌审旗庙上拜师学习当喇嘛。后因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决定从喇嘛庙撤回，让他在伊盟地区做秘密情报工作。赵在这段工作中表现好，很吃苦。

云北峰，是个蒙古族同志，当时他不是共产党员。我们派他到伊盟地区搞情报，建立据点，全面的开展工作。为了工作的方便，临派出时我和葛申同志解决了他的党籍问题。出去后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马静波，是我派往桃力民策反赵兆仁部队的。赵的部队是地主武装。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赵兆仁自卫军的第三大队长薛炳文亲自到三段地找八路军，我以三边警备司令部上校联络参谋身份与之接触。他说他与当地的其他地方武装有矛盾，要求八路军帮助。结果，以贺晋年（三边警备司令）名义委任他为什么司令（桃力民自卫军），让他回去掌握武装，发展的人员全归他掌握。薛要求我们派人去协助他开展工作，我们选定马静波去。马先去一次，未见着人。第二次又派他去，马不愿去。当时正是绥包战役期间，情况很紧急，我们请了三边专员罗成德与马静波谈话，我也参加。最后还是决定派他去。马静波去后，面见赵兆

仁，尚接待。后来由于特务策划，将马静波逮捕，送归绥管押，后以交换战俘形式，释放了马静波同志。

鲁南，是李启明同志在绥德搞情报工作时发展的，后来被国民党发现了，将其秘密逮捕，他自首了。敌人又把他派回延安搞反侦察。他到了延安后，又把特务搞他的情况全部告诉了李启明同志。鉴于这种情况，李启明觉得这种人不能留在延安，于是于四五年又通过我们情报组，将其派往桃力民、东胜一带活动。鲁南很精明能干，出去后表现不错，打入了绥远省某特务机关，了解到很多重要情报，与晋绥公安局挂了勾，随后将工作关系转去。

梁济民，四五年由三边经伊盟去临河、五原，找傅部里的一个关系（刘瑞森介绍的关系）接头。但是，在途中梁与交通发生了经济矛盾，由于交通叛变告密，梁被捕，管押在国民党五原县看守所。到了一九四六年，有一个名叫赵宝善的商人来找我们，自称是和梁济民在一块关押的人，他说梁托他出去后找联络科和我。根据此人所述，我们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真象他所说的那样，梁济民专门嘱咐他与组织联系，其根据是他所说的情况与何书田在五原了解的情况基本相符；另一种是敌人为了弄清和证实梁是否是我们派出去的人员，而进行的侦察（即狱侦）。鉴于这两种可能，为了保护梁济民同志，在没弄清真实情况前，我们没有向他说实话，把他拘留审查了。

我们这次建立绥蒙情报组，地点设定边，情报工作干部有些在伊盟常住。我当时是伊盟工委分管情报保卫工作的，任伊盟工委常委。绥蒙工作组干部在伊盟地区活动的就基本和工委合在一起了。那时，赵通儒同志提出某旗县委需要保卫干部就向我要，我就派某干部到那里去做保卫情报工作。一九四五年，赵会山在

鄂托克旗，为工委委员；张景文、邓发财在乌审旗，均为工委委员。这些同志就是情报组的干部。那时伊盟的情报工作就是靠绥蒙情报组做。但绥蒙组不单是做伊盟地区的情报工作，主要是做绥远省傅作义部队的情报。也包括宁夏等省。伊盟工委设城川，工委开会时我就回去，平时我住在定边，有时也到伊盟边境去工作。一九四六年春，鄂托克旗的阿拉庙事变，我也参与过一点工作。

一九四六年七月，根据上级的指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决定，将各个情报组与当地专署保安处合并。根据这一决定，绥蒙工作组与三边保安分处合并为三边地委社会部，赵文献是部长，邓国忠是副部长。我调任陇东地委社会部副部长。

# 烽火草原十二年

张贵斌 忆述

刘占宽 整理

有许多长期在伊盟从事革命斗争的老前辈，撰写了不少很好的回忆录，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我的这些忆述，不免有许多是共同的东西，但愿能起到拾遗补漏的作用。

## (一)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长驱直进，相继占领归绥、包头。位于陕甘宁边区北大门的伊克昭盟，一下从大后方变成了抗日前哨阵地，为了迎击日寇，保卫陕甘宁边区，绥蒙工委和骑兵团于一九三八年的五月，进入伊盟的腹地——桃力民。

绥蒙工委进入伊盟的时候，我和二哥正在达拉特旗的了红湾给大户丁二家揽工受苦。那年我才十二岁，我二哥才十五岁。我给丁家放的八十多头牛，十二头毛驴，年工资只有十二块现洋。我二哥给丁家种地，年工资是十五块现洋。我们兄弟俩，每天鸡叫前就出工，天黑圪洞洞才回来，白天没有见面的时间，只是在晚上收工后才能见上一面。

日本鬼子开进归绥、包头后，傅作义的部队象一窝蜂似的拥到了后大套。马占山、冯玉祥的队伍也乘黄河结冰的机会，从后套开到了偏关、府谷一带，中滩也退下来不少国民党的残兵败

将和地方武装。正在时局混乱不堪的时候，于一九三八年夏天，绥蒙工委的于占彪副团长带了王祥、贾多福、边万富、景从德、窦文林等人来到了达拉特旗的丁红湾。据说，他们原来是打算进包头的，到黄河畔看了看过不去，返回来就住在了丁红湾，时间不长，我就结识了于团里的周明星、朱七亮、景从德。他们看到我这个放牛娃很可怜，主动的就跟我接近，经常问我说：“小鬼，跟我们当兵吧？”他们看到我流露出的笑容，便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八路军打日本、为穷人闹革命的动人事迹。我听了，心里总是热呼呼的。那天，我正在打扫马圈时，于团长进来小便，看到了我，亲切地对我说：“小鬼，你愿意跟我们当兵去吗？”当时我真不知怎么回答好，只是对他笑了笑，表达了我内心的喜悦。晚上睡下的时候，翻来复去考虑当兵的事，终于作出了最后的选择——跟上于团当兵去。

那天晚上人静的时候，我找到二哥，悄悄地对他说了于团要我当兵的事。我二哥听到我要当兵去，睁着圆圆的眼睛，恶狠狠地说：“当兵？！我们祖祖辈辈就是受苦的命，你要当兵时，我就把你填了黄河！”后来我把二哥不要我当兵的事跟朱七亮同志讲了，他给我出主意说：“现在你对谁也不要说，等到我们走时，你跟上不就行了吗？”

经过几个月的抗日宣传，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报名参军的人陆续多起来，有个别大户的子弟也参了军，到年底的时候，中滩游击队将近有二百多人，我是第一个报名参军的青年。这支队伍开始是叫窦文林支队，副队长是边万富，下辖三个排，其中有两个排是在王应奎驻防，另一个排是在西山嘴丁家圪旦驻防。中滩游击队除了十几个骨干外，都是一些新入伍的青年。支队除组织大家军事训练外，还要分头做群众工作和抗日

统一战线工作。

中滩那时属包头县的第三区，西山嘴以西叫后套，西山嘴东至包头是中滩，现在达拉特旗的大树湾、乌兰公社，是包头县的第四区。因为当时离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间还不长，傅作义政府里和军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跟我党我军的关系尚好。所以，我们的队伍能在中滩站住脚。他的骑兵第七师叫“铁帽军”，在通过我们驻防的中滩时，还要取得我军的同意，然后牵马而过，彼此都很尊重。

于副团长在中滩住了三、四个月，就返回了绥蒙工委，接着，高副官和钟春林来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党的工作，跟西公旗、国民党、地方大户拉关系，搞统一战线。

一九三九年的一天晚上，日本鬼子向后套进军，哨兵发现后，立即向支队报告。我们登高远望，乌拉山下和黄河岸边，人喊马嘶，灯火通明，大队日寇向西进发。接着，傅作义的骑七师和日寇接了火，我们支队亦随即起身，过河进入杭锦旗巴拉亥沙漠巴拉之中。时隔不久，傅作义对日寇组织了反击，把他们赶出了后套。

我们支队回到桃力民的乌素加汉。伊盟工委组建了骑兵三营，第一任营长是曹动之，后来曹动之搞了联络工作，又从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调来牛岗任营长。牛岗带兵能力差，调回了延安，又由宋飞接任营长，钟春林任指导员。骑三营共有三个连，第一连连长是李生业，第二连连长是李占胜，我们支队编为第三连，窦文林任连长，边万富任副连长。

骑三营是伊盟工委建立起来的第一支正式武装，军事指挥系统隶属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所以编为骑兵第三营。

## (二)

一九四一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骑三营随伊盟工委撤到了靖边县，在那里休整了两个月后，又调到保安进行整训。骑三营的士兵大部分是伊盟人，在保安整训期间，身在深山老沟，天天吃玉米和小米，还得上山挖野菜吃，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战士归乡之心甚切，思想状况比较混乱。等到这年的七、八月份，我们从保安调到张家畔，跟定边县的骑兵营合并，编入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的骑兵第二团，团长是康建明，政委是郭秉孔，参谋长是史建明，高平任副参谋长。骑二团共有五个连，我是第三连的战士。这支队伍的主要任务是在陕北、伊南一带开展游击战，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

当时，定边和靖边县中间的安边、柠条梁两个据点还没有解放，是国民党部邓宝珊十一旅驻防。他的队伍里有我们不少共产党员，跟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蒋介石看出这步棋，除加强南线的军事部署外，命令北线的何文鼎十一旅，接替邓宝珊的十一旅，以便对我形成南北夹击的局面。为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阴谋，挡住何文鼎，上级决定由骑兵二团配合三旅九团，向北推进，解放了伊盟的城川。

城川是个比较大的天主教区，位于鄂托克、乌审、定边的三角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有一支地方武装——保四营驻防。解放时，骑二团占领黑梁头，切断敌人援兵，由九团主攻城川堡。从黎明接火，天亮时就结束了战斗。

一九四二年，骑兵一团和二团在甘肃的花池县编为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骑兵旅，旅长还是康建明，政治委员是朱子秀，副